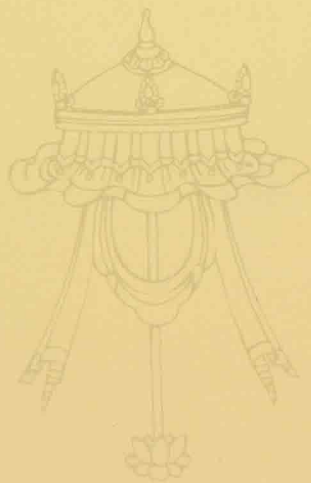


宋元时期 藏族地区经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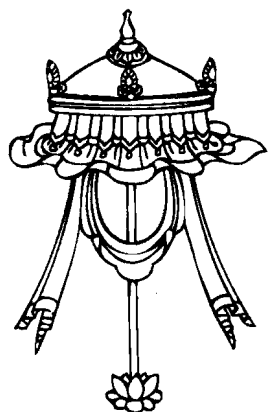
杨惠玲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宋元时期 藏族地区经济研究

杨惠玲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杨林楠

责任校对:吕 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杨惠玲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2

ISBN 978-7-01-009946-0

I. ①宋… II. ①杨… III. ①藏族-民族地区-地区经济-经济史-中国-宋元时期 IV. ①F129.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3093 号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

SONGYUAN SHIJI ZANGZU DIQU JINGJI YANJIU

杨惠玲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38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09946-0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本书系西北民族大学重点学术专著资助项目
本书系暨南大学博士创新基金资助项目

序

由于工作冗繁，此序已拖耽数月，这不是我的习惯。对于工作，我从来不拖，能赶早的决不赶晚，没想到此序却使我“违例”。如果可以推脱，我早已一推了事。但索序之作者是我的学生，索序之书又是我指导完成的博士论文，且这部书与我早年的安多藏族史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似乎作序乃“义不容辞”。

惠玲教授《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一书缘起于国家“九五”重大项目《西藏经济通史》的子项目《宋元藏区经济》。2004年我投标获此项目后，就交由当时正入我门下攻博的惠玲女士负责。她硕士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攻西北历史，导师为西北史名家胡小鹏先生，故该生的学术传承有一定的根基。到广州暨南大学后，我将早年在兰州完成的有关安多藏族史研究论文交由其修订整理。这样，她又对宋元时期藏族史有了一定的认识。故此她来负责《西藏经济通史·宋元部分》这一项目应是适合的选择。惠玲在攻博期间的勤奋是人所共知的，西北人的“能吃苦”精神在她身上尤能体现，再加上惠玲心慧聪敏，一点就通的借鉴学习，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不仅将国家项目完成，而且在此期间还与我合作完成和发表了几篇宋元藏族史的论文，并获“暨南优秀研究生奖”，在我门下的众多研究生中，惠玲明显是佼佼出众者之一。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研究》一书就是在上述项目的基础上扩张而成。“宋元时期藏区经济研究”在西藏经济史研究中最是薄弱的环节，也是一道难题，故该项目的招标数年无人问津。这一研究之难，一是宋元时期藏区历史线索不清晰，藏区各地的部族政权零星分散，时隐时现，形势极为繁杂；二是宋元时期藏区经济文献甚为稀罕，上不足以追唐，下则无法与明清相比。中文文献之文字记录仅局限于安多一地，而藏文文献则寥若晨星，仅有的几种藏文书中经济史料则犹如沙里淘金。然而，惠玲以极其坚韧顽强的毅力，以全面学习借鉴的方法，广搜文献资料，采撷前贤成果，特别是注重在藏文文献及海外汉学家的译著中淘金挖宝，居然完成了一部三十余万字的宋元藏族经济史的专著，内容不仅包括：宋元藏区经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经济制度、牧业、农业、商业、手工业、建筑业等等，而且照顾到卫藏、安多、康区三大藏区的不同与变化。全书系统全

面，内容详赡，每一章节均征引大量的汉藏文献支撑，不讲无据空话，遵循学术规范。且全书多处章节属作者首创，应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宋元藏族经济史研究著作，填补了国内藏学研究一大空白，我愿向学术界推荐。

惠玲教授成绩的取得，首先与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但更为重要的是她善于吸纳藏学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论是从文献、考古及翻译资料，还是这一领域的各种专题研究，博采众长，熔铸一炉，而构建鸿篇巨制，给人们展现一幅宏大的宋元时期藏区经济全貌，功莫大焉。

当然，此书亦给人留下了不少的遗憾，因作者不谙藏文，对于藏文文献的征引与深挖尚存缺略，但这种无可奈何只能留待作者今后弥补。望惠玲能在这一方面继续努力，以出更多更好的藏学精品。

汤开建

2011年10月8日于澳门氹仔

目 录

序	汤开建 1
绪 言	1
第一章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	15
第一节 藏族地区的自然概貌	15
第二节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的政治与宗教状况	19
第二章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的经济制度	39
第一节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的土地制度	39
第二节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的赋税	58
第三章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的牧业生产	85
第一节 牧业是藏族经济的重要部门	85
第二节 牧业生产区域的划分	92
第三节 牧业生产的发展	96
第四节 牧业的补充形式——狩猎捕鱼	106
第四章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的农业生产	108
第一节 农业在藏族地区经济中的地位	108
第二节 农业区域的划分	110
第三节 农产品主要种类	116
第四节 农业生产的发展	121
第五章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的手工业	127
第一节 金属矿冶与锻打铸造业	127
第二节 非金属矿冶业	144
第三节 皮毛加工业	150
第四节 酿酒业	160

第五节 陶瓷业	164
第六节 其他手工业	169
第六章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的建筑	175
第一节 宫殿城堡建筑	175
第二节 寺院建筑	182
第三节 碉楼建筑	194
第四节 塔和桥梁建筑	198
第五节 各类建筑材料	207
第七章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的商业	212
第一节 交通	212
第二节 藏族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贸易	221
第三节 藏族地区与周边其他地区的贸易	256
第四节 藏族地区内部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265
第五节 藏族地区通行的货币	279
第八章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地位、特点及作用	292
第一节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地位	292
第二节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	295
第三节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305
主要参考文献	319
后 记	333

绪 言

藏族居住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尽相同，习惯上分为三个大的地区，即上阿里地区、中卫藏地区、下多康地区，藏籍中则称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其中多康又分为多堆（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与多麦（今青海省及甘肃省南部藏族地区）。藏族地区又可以分为三大块，一叫卫藏（即元代乌思藏附带阿里三围地区），一叫安多（即元代脱思麻地区），一叫康（即元代朵甘思地区）。由这三大区域形成卫藏、安多、康巴三大方言区。用1949年以后的行政区划说就是，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的卫藏地区，以青海藏族地区、甘肃甘南藏族地区、四川阿坝州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安多地区，以四川省甘孜州、云南省迪庆州、西藏自治区的昌都、青海省的玉树州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康区。今天藏族的分布范围在宋元时期都已经基本形成。藏族地区宋元时期前后名称不好统一，所以本书谈到安多、脱思麻都是指同一个藏族地区，康、朵甘思是指同一个地区，卫藏指元代乌思藏附带阿里三围地区。不再于论述中作解释。这三大藏族地区是本书涉及的地域。时间界定在宋元时期。

宋代，吐蕃各部落散处，先后形成多个割据政权。入元以后，宣政院下设三个宣慰司，分别管辖三大片“地面”，即：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区域主要是脱思麻（mdo smad，又译作朵思麻、脱思马、秃思马等，它的范围包括现在的甘、青藏族地区大部分和四川阿坝等地），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安多藏族地区，其治所在河州（治今甘肃临夏）；通常把这个宣慰司简称为脱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区域主要是朵甘思（mdo khams，即朵堆、多堆、朵哥麻思，在今青海大部分、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也就是康区，通常把这个宣慰司简称为朵甘思宣慰司。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乌思（dbus，即卫，亦即前藏）、藏（gtsang，即后藏）、纳里速古鲁孙（mnga'ris skorgsum，即阿里三围）三块地方，通常简称为乌思藏宣慰司。这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是元朝政府针对当时当地藏族聚居的实际情况而设立的专门的军政机构。元朝宣政院所辖三大片“吐蕃”之地，是吐蕃人（今藏族先民）的聚居地区。但是该地的东境，即当时人所说的“朵甘思之地”，

即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东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青海中南部一带和“朵思麻地”，即今青海、甘肃的藏族聚居区，实际上是藏族人、汉人和其他民族杂居的地区^①，吐蕃腹地的乌思（前藏）、藏（后藏）和西境的纳里速古鲁孙（阿里三围），乃是吐蕃人最重要的聚居地^②。本书论及此三个宣慰司辖地。既包括阿里、卫藏藏族最重要的聚居区，又包括安多、康区吐蕃人、汉人和其他民族杂居藏族地区宋元时期经济的发展状况。

（一）学术史回顾

藏族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对藏族地区经济史的研究是藏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史在藏族经济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史料的搜集不易，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尤其在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具体状况的研究方面，更是缺乏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本书一个重要的研究意义就在于填补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史研究的空白，希望通过本研究来推动学界对这一课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宋元时期是藏族大分裂又逐渐统一的历史发展时期，此段历史背景复杂、内容丰富。这一阶段也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时期，政教合一制度对藏族社会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宋元时期也是藏族封建农奴制形成并确立的时期，封建农奴制形成后在藏族地区整整延续了700年，宋元时期的藏族地区经济发展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史料的零散及欠缺，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个别部门、个别领域的研究，研究开展得也不够系统深入。本书力求通过深入研究，使人们对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史有更客观、更理性的认识；通过系统性、全局性的研究填补学术界对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史研究的空白。

本书研究课题又极具现实意义。西藏、青海、甘肃等地为我国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本书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廓清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的经济状况经济制度、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状况和商业贸易、与邻近地区的经贸往来等问题，以便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更好地管理和发展藏族的经济，促进整个藏族地区科技、教育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从而为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经验。同时，还可以为国家有关

^① 今临潭多为汉族人，卓尼多为藏族人。

^② 韩儒林：《元朝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穹庐集》，页425—434。

部门制定合乎实际的民族、宗教政策,更好地贯彻、实施党的民族、宗教方针,提供学术支持。这也关系到藏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所以本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唐末吐蕃王朝瓦解,旧的政治体制被打破,经济领域也发生了重要变革,直到元朝在藏族地区设官建制、清查户口、额定赋役、缴纳贡赋,确立领主庄园制和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是藏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关于宋代藏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历史记载极为模糊。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藏族地区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广泛展开,但对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史的研究却很薄弱。有一些藏族通史著作,如《藏族简史》;王辅仁、索文清撰《藏族史要》;黄万伦《西藏经济概论》;黄奋生著,吴均校《藏族史略》;郑汕主编《西藏发展史》;祝启源《唵厮啰——宋代藏族政权》;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略》;半一之《青海地方史略》;黄玉生、车明怀、祝启源《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张云《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赵萍等编著《简明西藏地方史》;多杰才旦、江村罗布主编《西藏经济简史》;丹曲、谢建华《甘肃藏族史》;陈光国《青海藏族史》;仁青诺日编《藏族历史教材》等都有涉及宋元藏族地区经济问题,但多为宋元时期藏族封建农奴制的形成及与中原的茶马贸易等内容。这也是此课题研究较为深入的部分。关于这两个论题,学界已经有相关专著及论文集问世:多杰才旦《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吴从众编《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魏明孔《西北民族贸易研究》;陈崇凯《西藏地方经济史》的第三篇重点论述了西藏封建领主庄园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目前研究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的学术成果大多以单篇文章居多,宋代藏族经济的研究以业师汤开建先生的成果最为显著,有《公元11—13世纪安多藏族部落社会经济的考察》(载《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宋代甘青藏族人发展及其原因》(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5期)。此外,祝启源《唵厮啰——宋代藏族政权》一书的第七章有专门讨论宋代藏族经济的部分,内容涉及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城镇等。此外的单篇文章,按其论及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下列几部分: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寺院经济:李小艳《佛教寺院经济的由来与发展》(载《世界宗教文化》2004年第4期);宋秀芳《浅析西藏寺院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动因》(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罗莉《试析西藏封建农奴制下的庄园经济与寺院经济》(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

第5期);东嘎仓·才让加《唐以来藏族地区寺院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载《民族研究》1992年第3期);绒巴扎西《藏族寺院经济发生发展的内在缘由》(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等。上述文章的论述还基本停止在寺院经济的一般现象上,对其经济形态、经营方式等深层次问题的讨论,尚有待展开。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农牧业:因为史料的欠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有毛继祖、张天锁《西藏古代农牧业生产技术概述》(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3期合刊);任树民《宋代蕃部对西北边疆的开发》(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3期合刊);陈新海《青海农业发展史中的人地关系》(载《青海民院学报》1998年第2期);柳依《宋代对吐蕃地区的土地开发》(载《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仁庆扎西《元代经营甘青藏族地区概述》(载《社会科学参考》1985年第15期)等,多为泛论。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手工业:有任树民《宋代内地边缘吐蕃部族的工艺文化》(载《西藏艺术研究》1997年第3期);张庆有《藏族铜鑲工艺及工艺学论著综览》(载《西藏艺术研究》1995年第1期);[法]噶尔梅著,杜永彬译《9—15世纪的汉藏艺术文献资料》(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1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法]布尔努瓦著,耿升译《西藏的金矿》(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4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李玉香《略述西藏早期冶金业》(载《西藏研究》1994年第4期);何峰《从史诗〈格萨尔〉看藏族部落的武器装备》(载《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法]莎耶著《西藏瓷器制造考》(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9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容铁《西藏制陶业一瞥》(载《中国西藏》1994年第5期);高志伟《浅析青藏高原的琉璃器》(载《西藏研究》1996年第1期);谢继胜《吐蕃西夏历史文化渊源与西夏藏传绘画》(载《西藏研究》2001年第3期);李翎《擦擦名称考》(载《寻根》2005年第1期);旭江《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元代佛事器具——擦擦》(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2年第1期);们发延《藏传佛教的唐卡艺术》(《中国宗教》2004年第8期);李翎《宋代缂丝佛像唐卡》(《世界宗教文化》2002年第1期);谢继胜《黑水城出土唐卡研究述略》(《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杨正荣《安多唐卡初探》(载《西藏民俗》1997年第1期);[新西兰]托尼·呼伯尔著,张岩译《十一世纪来自卫藏的印度佛教“擦擦”》(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2辑)等。关于宋元时期藏族地区手工业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藏族地

区雕塑、绘画手工艺方面。国外对藏族地区冶金业、陶瓷制造业、擦擦及木刻工艺也有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总体来讲,宋元时期藏族地区手工业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涉及面及深度还不够。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建筑业:此研究因考古材料的发现而逐渐展开。主要有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扎巴《藏族古建筑发展简述》(载《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杨嘉铭《丹巴古碉建筑文化综览》(载《中国藏学》2004年第2期);李佳俊《夏鲁寺一个永远读不完的书》(载《西藏民俗》2003年第2期);石国鹏《话说妙应寺白塔》(载《佛教文化》1999年第1期);张亚莎《藏族中世纪建筑》(载《西藏艺术研究》1998年第2期);冯智《西藏早期藏式佛塔文化》(载《西藏民俗》1998年第2期);洛桑群觉、陈波《西藏的灵塔与金顶——兼谈后弘期西藏的黄金及黄金制品》(载《西藏研究》1997年第2期);陈耀东《夏鲁寺——元官式建筑在西藏地区的珍遗》(载《文物》1994年第5期);洛松向秋《藏族地区寺庙的金顶》(载《民族》1993年第9期)等,其中张亚莎的文章概括论述了宋元时期藏族地区建筑的特点。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商业贸易:以宋元时期茶马贸易的论文最多,研究也最深入。汤开建《北宋与西北各族的马贸易》(载《中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1992年);汤开建、杨惠玲《宋金时期安多藏族部落与中原地区的马贸易》(载《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林瑞翰《宋代边郡之马市及马之纲运》(载《宋史研究集》中华丛书编委会第11辑);张云《茶马古道长 藏汉情义深——西藏和内地之间茶马古道探幽》(载《中国西藏(中文版)》2005年第4期);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载《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雀丹《藏族的马文化》(载《民族》2000年第1期);申旭《滇藏茶马古道论略》(载《西藏研究》1998年第3期);贾大泉《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载《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2期);吴从众《藏族和茶》(载《西藏研究》1993年第4期);陈泛舟《北宋时期川陕的茶马贸易》(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白振声《茶马互市及其在民族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陈泛舟《南宋的茶马贸易与西南少数民族》(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贾大泉《宋代四川与吐蕃等族的茶马贸易》(载《西藏研究》1982年第1期)等文章。

关于宋元时期藏族地区商业的其他方面:有尹伟先《青藏高原的麝香与麝香

贸易》(载《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王一清《历史上甘南的民族贸易简述》(载《中国藏学》1993年第3期);李竹青《试论西藏的边境贸易》(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任树民《北宋时期丝绸东路的贸易网点》(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张雪梅、秦伟《〈米拉日巴传〉中的经济社会与宗教社会》(载《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4年第1期)等。关于货币的研究成果有:李峰《唃廝囉政权的交换贸易及货币形态》(载《中国藏学》1994年第3期);张虎婴《元代纸币在西藏地方流通考》(载《中国钱币》1984年第4期);肖怀远《西藏地方货币初探》(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等。张云《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考》(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为西藏赋税史的研究做了开创性工作。关于人口的有:王克《藏族人口史考略》(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2期)。

宋元时期藏族地区交通:有李豫川《西藏古代的桥》(载《民族团结》1996年第4期);吴焯《青海道述考》(载《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吴焯《古代青海交通西域的路线及其历史沿革》(载《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顾吉辰《北宋时期中西交通考释——兼谈吐蕃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及作用》(载《西藏研究》1989年第2期);李之勤《元代陕西行省的驿道和驿站》(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祝启源、陈庆英《元代西藏地方驿站考释》(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洛桑群觉、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驿站》(载《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蔡志纯《元代吐蕃驿站略述》(载《西藏研究》1984年第4期);王叔凯《古代青海中西交通考》(载《青海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元代驿站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以藏学家陈庆英先生的研究最为突出。

此外一些讨论藏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关系的论文,亦涉及藏汉经济交流。陈崇凯《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史论纲》(载《西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任新建《论康藏的历史关系》(载《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何耀华《西北吐蕃诸部与五代、宋朝的历史关系》(载《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吴从众《自古不可分割的汉藏关系》(载《青海民院学报》1998年第1期);嘎尔迪、闵文义《13世纪蒙藏文化关系的确立及其重要意义》(载《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陈崇凯、顾祖成《元明中央对西藏经济的扶植政策及作用》(载《西藏研究》1997年第2期);策·才吉拉胡《蒙藏两民族文化交流中的藏医古文献》(载《中国藏学》1997年第4期);薛学仁《元代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

化交流》(载《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石硕《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13世纪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形成的必然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张云《元代吐蕃与周边诸地的关系》(载《甘肃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林文勋《宋代四川与吐蕃藏族地区的贸易》(载《思想战线》1992年第1期);顾吉辰《北宋时期吐蕃政权与同邻的关系》(载《西藏研究》1991年第1期);苏晋仁《元代对西藏地方的管辖和影响》(载《民族研究》1991年第6期);顾吉辰《北宋时期吐蕃政权与同邻的关系》(载《西藏研究》1991年第1期);陈泛舟《略论历史上的川西北地区的藏汉贸易》(载《藏学研究论丛》第二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洛桑《论西藏历史上的“供施关系”》(载《中国西藏》1990年第2期);黄万纶《唐宋时期西藏同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历史考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等,主要集中于藏汉茶马贸易、藏汉关系及西藏经济对中原地区的依赖性等内容。

通过对此课题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当前研究的几个特点:

(1) 国内学界多立足于中原王朝的立场,展开对藏族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藏汉交流史的部分,其研究不够全面。

(2) 研究多集中于封建农奴制的形成、藏汉茶马贸易、藏汉经济关系问题,涉及宋元时期藏族地区农牧业、手工业、商业贸易等经济具体状况的研究文章不多,许多研究领域处于初始阶段。这无疑是上述研究的一个缺憾,也是本课题得以填补空白之所在。

(3) 研究对象或为宋代安多藏族部落或为元代吐蕃,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在藏族地区经济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阶段,现在学术界对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史整体性、全局性的研究十分缺乏。

(4) 对藏文史书及考古发掘中涉及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的材料搜集、运用很不够。

(二) 资料来源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汉、藏文文献,尤其是藏文文献、宋元人文集、藏族地区地方史志资料、文史资料及考古资料中涉及经济的部分,同时也注意对外文文献的收集利用及国外藏学研究成果的吸纳。以期最大限度展示宋元时期藏族地区经济制度、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贸易、寺院经济等方面的具体状况。

由于三大藏族地区地域辽阔,自然环境不同,经济上差异较大,而且时间跨

宋、元两朝，两朝的政治特点及与藏族地区的关系、对藏族地区的影响均有所不同。再加上文献资料严重不足，所以研究有很大难度，这是本书亟须解决的瓶颈所在。现存关于宋元藏族地区经济的史料主要是关于安多藏族地区的，且多为汉文史料。主要有汉文古籍《宋史》；《金史》；《辽史》；《元史》；马端临《文献通考》；徐松《宋会要辑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王称《东都事略》；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赵汝愚《诸臣奏议》；《元一统志》；《经世大典》；《元文类》等。有宋元人文集：毛滂《东堂集》；张方平《乐全集》；曾巩《隆平集》；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前录》；苏颂《苏魏公文集》；李复《潏水集》；李纲《梁溪集》；文彦博《文潞公文集》；韩琦《韩魏公集》；李远《青唐录》；刘攽《彭城集》；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史学界从汉文史料中辑录整理藏族史料的工作已经很有成绩，陆续有藏族史料集出版。有汤开建、刘建丽辑校《宋代吐蕃史料集》（1—2）（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陈燮章、索文清编《藏族史料集》（1—3）（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陈乃文、陈燮章《藏族编年史料集》（1—2）（民族出版社，1990年）；苏晋仁等《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拉巴平措、陈庆英主编《唐·吐蕃重要文献选辑》、《唐代吐蕃历史系年》、《〈元史〉藏族史料选辑》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内部资料等书，这些资料汇编将上述除去宋元人文集外的汉文古籍中的大部分藏族史料都已经汇集到一起，为今天藏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但汉文史料记载卫藏地区经济的史料很缺乏，所以本书研究着重点在安多藏族地区。

本书卫藏地区的研究，主要利用了如下藏文史料：

1.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成书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①是研究元代和明初藏族地区历史的一部重要的藏文资料。该书对萨迦派的历史、元朝在藏族地区的军事、赋税、设立驿站、法律、本钦的委任等重要历史问题有详细记载，故该书为本书写作中重点参照的资料。

2. 桑杰坚赞著《米拉日巴传》^②。15世纪时，后藏僧人桑杰坚赞（1452—

^①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东嘎·洛桑赤列教授为《汉藏史集》藏文版所写的写作年代简介。

^② 桑杰坚赞著，刘立千译：《米拉日巴传》，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1507, 又名乳毕坚金——意为“骨饰者”)根据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米拉日巴的故事撰成《米拉日巴传》。米拉日巴(1040—1123)是西藏佛教噶举派第二代祖师,一生坚韧不拔、实修苦修,用道歌形式宣传教义,广收门徒,在藏族人民中有广泛影响,是西藏佛教史上一位重要人物。该书重在宣传佛教,但在绘声绘色的记叙中,客观上也反映了米拉日巴当时所处社会的政治面貌、农村经济、乡里风习以及人民的思想感情等等。故这本书又是记述11—12世纪西藏地方社会历史的极其珍贵的著作。

3. 大司徒·绛求坚赞著《朗氏家族史》^①。其内容的第二部分是绛求坚赞(1302—1371)的自传,它以绛求坚赞在同雅桑、萨迦、止贡等地方势力的斗争为线索展示了14世纪前半期藏族地区社会的广阔生活图画,详尽地记载了当时西藏同祖国密切而广泛的联系,藏族地区各地方势力为争夺领地、属民的复杂纠葛,上层贵族的生活,乃至物价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绛求坚赞虽是一个严守戒律的上层僧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感受到宗教宿命论对解决现实的经济和政治纠纷丝毫无济于事,所以他的自传仅仅记录了他一生曲折的经历,不像其他藏史把历史作为宗教的附庸,而且恰恰相反,行文中他多次批判了天命论。元代末期藏族地区社会的面貌,无论藏、汉文史籍的记载都很简略,而绛求坚赞自传翔实的叙述正好补充其他史籍的不足。其第三部分主要是绛求坚赞用诗歌形式总结他的一生,补入了不少史料,有重要史料价值。

4. 廓诺·讯鲁伯著《青史》^②。作者为元代著名译师,廓诺·讯鲁伯曾译有许多密宗教法。于元顺帝至元十八年戊戌(1358年)著成的《青史》初稿,是其著名的代表作。全书分十五辑,其中有教法来源、西藏历代王朝、西藏前弘和后弘期佛教、新旧密乘、教派传承、法门来源等第一手珍贵史料,而且《青史》纪年大都可靠^③。

5. 释迦仁钦德著《雅隆尊者教法史》^④。1376年著,雅隆尊者释迦仁钦德出身吐蕃王族,是吐蕃王朝分裂后在山南兴起的雅隆王室的子嗣,所以对雅隆世系的记述就构成这部史书的重要内容。作者通过对佛教源流的记述,传播了本民族

① 大司徒·绛求坚赞著,赞拉·阿旺、余万治译,陈庆英校:《朗氏家族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304。

② 廓诺·讯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718。

③ 廓诺·讯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718。

④ 释迦仁钦德著,汤池安译:《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8。